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

李 工 真

19世纪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加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或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感,一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极力主张对这场社会裂变施加一种有控的干预,并提出德国应走一条以新教伦理和公共福利为方向的“文化民族共同体”的独立发展道路,以期通过一场新的社会组织化的转型来达到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导致了地方性、私人保险和救济机构的出现,而且也为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化”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这项政策的推行对缓解劳资矛盾、增强民族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福利制度的开创国,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为什么自从1883年以来,尽管德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战争、灾难和那么多的政治败落和转折,而它的福利制度却能一直保持它起源时的标志,并根据它最初的原则不间断地得到发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首先探讨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其意义。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是与德国从封建农业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工业无产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1807年以来,在法国政治大革命和英国工业大革命的冲击之下,普鲁士容克贵族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农民解放”、“城市自治”、“就业自由”、“废除行会限制”等法令的公布,不仅在德意志人口中唤起了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意味着德意志传统社会关系“大裂变时代”的到来。

传统价值标准的动摇和旧有社会联系的崩溃是与新的工业生产关系的转变、来自农村的人口大规模移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技术性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能充分利用企业主所有权,并单方面地对收入和财产分配施加有利于已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大大加速了两极分化。因此,工业繁荣不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等级的”仅靠工资为生的无产者。固然,漫长的劳动时间、低微的酬劳、超经济的剥削在封建农业经济的年代里早就存在,但在当时,由于植根于服从义务上的“国家观念”,在生产者的头脑中,所有这些是被视为“命运”

的安排而不得不忍受的。而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对新的自由、个性理想原则的承认,使得即使是同样事实也变得不堪忍受”^①。何况,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过程的危险性,生产者生存的无保障性已大大加剧了。“工业化新机械完全缺乏足够的安全装置,使得技术失误造成的工伤事故变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②。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仅受着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由于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其来源也毫无保障。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又造成了日益紧迫的住房问题。当“过去那种与容克农庄等级制——团体性的社会秩序以及普鲁士宗法制度中的慈善机构的预防性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社会的安全机制萎缩和丧失了”的时候^③,疾病、工伤残疾、老龄等问题对产业工人的生存来说也就显得更具威胁性了。农业社会的那种“共同体文化”消失了。资产者狂热的“拜金主义”仅仅只能使无产者群众更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贫穷。严酷的经济事实意味着他们不过是劳动力的载体,不存在着对他们自由和尊严的个性的任何承认,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任何合乎道义的约束,只有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标志着德意志无产者已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并开始奋勇反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纷纷建立。1863年,拉萨尔组织起全德第一个工人独立的政治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在埃森纳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将自己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组织起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将政治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存统治秩序。

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仅标志着德意志社会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裂变造成的压力已危及现存统治秩序。它迫使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最后不得不去进行一场新的社会组织化的转型。“福利国家化”政策正是作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化的重要内容才出现的。

二

最先提出应对这场“社会大裂变”施加一种有控干预的并不是容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是一批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

在德国,官僚与学者阶层,这两个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是被作为“国家理想主义的载体”、“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来看待的。官僚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的容克世家子弟。他们以“国家整体利益的辩护人”、“超党派的公益保护者”自居^④。“社会裂变”并导致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与这些官僚改革派们的愿望相反的。尤其是那些直接与社会发生接触的最敏感的地方管理部门的官僚们认为:“国家与社会应用足够的手段来阻止贫困的尖锐化,以维系现存关系的稳定”,并主张“国家当局应在抛开了旧的开明专制主义的‘整体福利’之后,重新返回来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义务”^⑤。

学者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从不将自己理解为属于哪个固定的阶级,而是以“真理的化身”、“民族文化的载体”自居。那些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支配国家权力的人文学者们认为自己“可以去充当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调解人”^⑥。加之当局的各级官员往往不是他们的同学,就是他们的学生,这又使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可望通过这种与官僚阶层的天然联系来实现。所有这些,唤起了他们愿为缓解这场社会裂变而主动承担社会义务的极大热情。因此,当他们看到“无产者日益增长的骚动会将整个现存统治秩序带入危险的激流”时,他们主张:“部分调整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平衡现存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重新结成一个整体。”^⑦

作为资本拥有者的企业主则主要根据切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来作出反应。当“社会问题”尖锐到工人罢工经常性地中断生产过程,影响到他们利润的获取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作出某种让

步。”这种让步是由生产政策上的必要性、工人再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对利润赚取的关系来决定的”^⑥。是否作出让步或作出多大让步，则往往取决于罢工威胁性的程度、资产者财力的大小。因此，在德意志，恰恰是那些最大的、也是财力在日益壮大的工业巨头们首先打算在工矿企业中“办福利”，并将其视为“对付工人暴动的社会保障的前提”^⑦。相反，那些正处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两极分化的磨石之间苦苦挣扎而自顾不暇的中小企业主却对工人的罢工听之任之。

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观念是与专制国家“无冲突的理想社会”的观念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神职人员对社会裂变的敏感反应中，不仅有对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反感和对现代“大城市文明”的厌恶，而且更有对“拜金主义”狂潮带来的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但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城市化及工业中心经济现代化导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快了非教会化和非基督教化。因为当作为教民的产业工人无论怎样通过“虔诚的祈祷上帝”和“内心生活化”也无法改变自己不堪忍受的境遇时，他们当中相信“上帝救世主”的人便越来越少。因此，特别是城市中的神职人员，普遍赞成“进行一场反贫困的十字军远征，并在社会上重建基督教信仰的统治地位。”^⑧

在对1844年“西里西亚事件”的反应中，这批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自发组织起一个分支遍布普鲁士的“为劳工阶级的福利的中央协会”。他们企图依靠普鲁士国家的传统、基督教的社会伦理以及“个别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中的社会改革潜能，来防止威胁到现存统治制度的社会革命。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建立地方性、储蓄性的保险金库，进而建立起医疗、残疾——抚恤金的保险机构，并在德意志人口中广泛宣传‘公益’知识”^⑨。

尽管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用前工业化时代的价值尺度和观念水准去看待贫困化问题的，但是，由于他们“自由主义”的结社形式，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成员甚至与在海外的马克思、恩格斯有着通讯往来，该组织连同它的不过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补救性方案立即遭到了普鲁士内政部的粗暴干涉。因此，当他们感到“一个无阶级冲突的市民社会的蓝图在一个非自由主义原则的、权威凝固化特点的政府之下不可能达到了”的时候^⑩，毫不奇怪，这个协会的大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成员，不仅参加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48年革命的失败，50年代工业化进程的划时代突破，1871年普鲁士容克领导下的统一战争的最后成功，再度使德意志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了改良。这种历史发展在思想界、学者阶层中导致了“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mus)的出现。

“讲坛社会主义”作为这场改良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60年代末经济学界的一场“思想突破”为基础的。这场“突破”所表达的不仅有对无产者革命的恐惧，而且也有对曼彻斯特自由放任主义、绝对的利己主义的尖锐批评。讲坛社会主义者们强调：“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经济中要走一条在历史上——经验上能得到证实的独立发展道路”，“那么在德国就应走一条以新教伦理道德原则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公正为方向的文化国家的发展道路。”^⑪对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后来指出：“那些最后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是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但还不单单是这些东西，它必须有如下的东西作补充：即理性的思想，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的经济上的伦理道德。”^⑫“讲坛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民族共同体”及“文化民族”的概念，并从中导出这种观点：“维持现存社会——经济——国家秩序的健康发展，仅仅只能通过改革的道路来达到。在今天的社会危机中，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出现了经济上的变化和新阶级的导入，而在于民族的文化和权利地位受到了这种发展所伴随的革命的危及，必须用改革来避免革命。”^⑬这一观点得到了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一致赞同。

讲坛社会主义者于1872年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协会”，是一个除了社会民主工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有其成员参加的社团组织。在这个协会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的官僚开始在

自己的管辖区内建立起公益性、合作性、地方性的保险机构,并开始修建工人住宿区。基督教会也开始建立“慈善同盟协会”、“内心使命协会”之类的救济机构^⑨。而少数企业主,尤其是那些更大的经济巨头,如克虏伯、施图姆、施汀纽斯、博尔西吉、阿贝等,从纯粹的家长式态度出发,不仅建立了企业辅助性保险机构,还开始实行带薪度假制,开办托儿所、工人食堂、工人医院以及建造工人住宿区^⑩。对工伤事故所造成的个人损害承担处理义务的制度也开始在大型厂矿实行。“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将工人的技术失误所造成的伤残归于工人自身的责任的,致使所有这些企业的工伤事故的80%并未得到担保。”^⑪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私人性保险机构的建立仅仅取决于少数雇主的自愿,它根本不可能为所有工人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

此时,“社会政策协会”的纲领设计者——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认为:“必须动用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推行一项‘福利国家化’政策。”他极力主张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⑫。这表明“讲坛社会主义者”已开始越过“中央协会”的“福利私人地方化”的补救性方案,并迈向“福利国家化”的新社会组织方案了。但这种方案能否实施,不仅取决于帝国最高当局的态度,而且也取决于这个帝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妥协。

三

国家最高当局决心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来阻止“社会裂变”是在1871年帝国统一后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首先,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以及1871年法国发生的巴黎公社起义引起了俾斯麦对无产者革命夺权的恐惧。尽管俾斯麦也曾在1867年北德联盟宪法和1871年帝国宪法中满足了工人在普选权上的要求,但这并未能阻止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

其次,经济危机加速了两极分化的“社会裂变”。经济自由放任的弊端进一步暴露,致使国家最高层“对一种先前稳定和谐的自然秩序的信念,以及对市场自我调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有目的的支配的信念严重动摇。”^⑬俾斯麦感到:“公益再也不可能通过经济的绝对自由、自我决定的手段、国家的克制,而只能再度靠加强国家主动性的措施才能达到了。”^⑭

再者,瓦格纳的改革纲领鼓励了宰相采取行动^⑮。瓦格纳仔细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绝大多数理论是“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这位宰相府中的常客向俾斯麦宣扬的改革目标是与容克国家的内外政策目标完全一致的,即“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巩固现存统治体系,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达到这个民族国家对全体国民的一体化。”^⑯通过与俾斯麦思想上和私人关系上的接近,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俾斯麦,以致于在两次内容相同的表态中,俾斯麦使用的完全是“瓦格纳式”的语言:“只有现在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权采取措施,方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办法是由政府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中看来合理的,并能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⑰

在俾斯麦看来,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便能在无产者中制造出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他公开声称:“这种思想是随着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感情才可能产生出来的。谁可望有一份养老金,谁就比没有这种可能的人要满足得多,也好对付得多。”^⑱因此,这位“铁血宰相”开始用“皮鞭加糖块”的手法来应付这场“社会裂变”和工人运动的挑战了,即在用1878年的《非常法》打击社会民主工党的同时,用社会保险的立法去赢得工人阶级对这个国家政权的好感。

1881年夏季,“俾斯麦提案”揭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议会辩论的拉锯战。通过国家法律规定来强制性地对工人实行福利保险的原则,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外,没有遭到其它政治势力的反

对。社会民主工党议员认为：“这只会使工人阶级更多地依赖现存国家。”^⑧大资产者对“俾斯麦提案”表示了赞成。克虏伯认为：“我们为工人节省下来的这些钱就是在为我们自己节省”^⑨。而施图姆声称：“正如工人服从雇主是义务一样，雇主可以因上帝和法律的原因大大超过劳动合同的界限来关照雇员。”^⑩但俾斯麦想建立一种完全由帝国和企业主们出资，工人无须缴纳保险费的帝国保险制的计划，却由于强调“联邦主义，反对国家专权”的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主义进步党、改革党人的坚决反对而告失败。

直到1883年，第一部保险立法《医疗保险法》才在一场容克贵族、国家官僚、学者、企业主之间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妥协中诞生出来。随后又有了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龄——残疾保险法》。所有这些法规当时都仅仅只是针对年工资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受雇者的。在医疗保险方面，雇员缴纳2/3的入会费，另外1/3由雇主缴纳，入会费平均占雇员工资的2%至3%。在工伤事故保险方面的支付由雇主单方面承担。在老龄——残疾保险方面，雇员与雇主各支付一半的入会费，这笔入会费占工人工资的1%，同时，国家对投保人每人投放50马克的帝国津贴^⑪。一种涉及到国家法律强制和社会自我管理原则、投保原则、法定标准索赔原则、组织多样化原则的社会福利保险制逐渐形成了。

但是，俾斯麦用保险立法来阻止工人运动的企图并未成功。因为医疗保险公司是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根据投保人的出资份额来选举管理小组的，工人有权选出其中2/3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很快觉察到了并决定利用这一点。这样，“医疗保险公司的各种管理机构很快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层干部和领导人物发挥实际政治影响力的更高级的学校和场所。”^⑫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在《非常法》条件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84年，他们还只获得55万张选票，而到俾斯麦下台的1890年，已获得142.7万张选票了。

威廉二世上台后，认为“皮鞭加糖块是一种愚蠢的结合”，“唯有废除《非常法》，保险制度才可能有助于改变工人阶级对国家的态度。”^⑬他不仅支持废除《非常法》，主张越过俾斯麦保险体制的界限与规模，而且开始大胆启用那些具有强烈的“讲坛社会主义”思想的官僚来担任主管社会问题的内政部国务秘书，如贝尔勒普施、波萨多夫斯基和贝特曼——霍尔维格。他们从90年代开始便着手规定了星期日休息、禁止雇佣童工、11小时工作制、建立劳资仲裁法庭等劳工保护立法，并修建工人住宿区。“福利国家化”政策也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行开来。

1900年，《工伤事故保险法》得到扩大。“凡由于工伤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者，可从企业主那里得到相当于他年收入的3/4作为养老金，而过去仅为年收入的2/3。”在养老保险方面，1900年也作了新规定：“凡支付了24年之久投保费并年满60周岁的投保人可享受养老保险金，而以前必须支付30年投保费。”1903年，《医疗保险法》“开始对工人家属承担医疗义务。并规定将病人无法工作两天后支付给他的每日2马克保险费的有效期由过去的13周延长到26周。”1911年新颁布的《帝国保险管理条例》中增加了《遗属保险法》。该法规定：“凡作为养老保险投保人的遗属，而自己又丧失了劳动能力者，或是其16岁以下的子女，每人有权享受相当于死者收入20%的保险费。”^⑭

1911年，议会还一致通过了《职员保险法》，它不仅将社会福利网扩大到所有的受雇者阶层，而且也是与国家的内部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当初，俾斯麦没有去考虑那些年工资收入超过2000马克以上的受雇者——职员。这个阶层尽管与产业工人同样属于受雇者阵营，却在劳动时间、劳动独立性、劳动收入上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作为企业主“私人官员”的这种社会存在，导致了他们向中产阶级靠拢的社会意识。现在，帝国当局和企业主们希望通过一种特别的保险法规来促进他们这种等级上的自傲感，从而达到对受雇者分而治之的目的，并在不断裂开的两

极分化的鸿沟中填进这种“平衡力量”。而这些职员的人数随着 90 年代以来技术与企业管理的突破性发展以及工业结构的变动还在日益上升。《职员保险法》成为这个“新中产阶级”的“出生证”。因为该法将职员在劳动关系中优于产业工人的特权转移到社会保险的享受待遇上去了。该法规定了用一个帝国统一的主管机关来管理职员的保险事务。“职员与雇主各缴纳一半的入会费，该会费占职员工资收入的 7% 至 8%，明显高于产业工人，而且保险金额与国家官员的退休金看齐。”“职员去世后，其遗属无论有无劳动能力，均可享受其工资的 40%。”^⑧。帝国当局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将国家与人口中的特定阶层联系起来的战略，至少在职员阶层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此，“福利国家化”政策已走出了它的开端期。

四

容克政权推行“福利国家化”政策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容克“国家的利益至上原则”，这项政策正是作为反对工人运动的国家力量和权力因素从上推行下来的。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为了穷人的政策，而是为了对付有威胁性的穷人的政策。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主要得益者首先是容克贵族和霍亨索伦王室。在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存的复杂化局势中，“福利国家化”政策的推行扩大了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这种政策的推行中感受到：“一个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工党只会使容克政权更有理由地以具有纳税能力的资产阶级为代价去软化工人的反抗。”^⑨这就扫除了自由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与工人运动之间政治结盟的可能性。同时，这项政策的推行也对德国工人运动长期的政治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 1890 年《非常法》废除以后，它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人物中培养起这种观点：“只要我们拥有了议会的大多数，这个国家是可能象贯彻资本的利益的利益那样，来贯彻工人的利益的。”^⑩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容克政权所面临的压力，并提高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地位。所有这些效果正是这个容克政权所期待的。这个由“前工业化精英”所执掌的政权，竟能在工业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中死里逃生，并不断强大，直至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部分答案是不难在“福利国家化”政策的推行中找到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作为“避免内部冲突的战略”^⑪，也是有利于德意志的对外竞争与扩张的。正如当时的立法者们都看出的那样：“人们几乎不可能从缺乏任何公正待遇的、丧失安全保障的、陷于饥饿之中的工人那里去期待必要的爱国主义”^⑫。这项政策的推行在帝国时代“民族集合化”道路上的作用与影响，人们也是不难在 1914 年社会民主工党“为祖国而战”的口号中，在各德意志政党“城堡和平”的缔结中找到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使德国资本主义获得了更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的产生标志着德意志社会对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克服。它的思想内核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即“纯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上的自由并不能为工人阶级的生存提供真正的自由，因而至少必须通过这种社会福利保障去补充这种法律上的自由。”^⑬固然，这项政策的推行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但客观上却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因为它不是一项加剧穷人痛苦的政策，而是一项减轻穷人痛苦的政策。它毕竟在应付疾病、工伤事故、老龄——残疾等问题上为毫无保障的工人提供了一张“社会福利网”，这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当时是找不到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有益的。它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绝对量的变化上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开始了滑动，并同时使这种滑动成为了生产者继续

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一旦从国家法律上打开了这个缺口,这种滑动方向便显得难以逆转,它将迫使统治者不断地去调整经济社会的现存秩序。

“福利国家化”政策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推动科技进步的社会机制。例如:企业主单独支付全部工伤事故保险金的法规,由于大量工伤事故的发生,意味着企业主必须为此支付大量金额。这种经济上的“不合算”迫使企业主和科技工作者不断改进陈旧机械,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益的技术装备,研究安全生产措施,这无疑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又如“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也使得医院对工人来说不再仅仅是最后拖延生命的场所,而成了名符其实的治疗机构。”^⑨工人的医疗和住院现已成为了可能。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又迫使政府和社会投资增设医学院、护士学校,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推动医药研制和药械制造业的发展。这无疑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当然,所有这些进步都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一种不断斗争的结果,其次才谈得上是统治者作出的让步。俾斯麦后来也承认:“要不是有社会民主工党,要不是有许多人害怕他们,我们迄今在社会改革中已有的那些进步也就不存在了。”^⑩正是在这种斗争与让步之间,我们找到了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

如果说有一条德意志独具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话,那么“福利国家化”政策无疑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在缓和劳资矛盾、增强民族竞争力以及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的特点,使它自从1883年开创以来便一直在帝国时代、魏玛时代、甚至第三帝国时代,直到今天的联邦德国不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最后也陆续地为所有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仿效。

注 释:

- ①⑦②③④ 弗里德里希·吕特格:《德意志社会经济史》,海德堡1979年版,第499、528、528、529页。
②⑬ 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1990年版,第676、676页。
③②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社会福利国家的机会和限度》卷1,图宾根1983年版,第42、47页。
④ 托马斯·尼佩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48页。
⑤⑥⑪⑬⑮⑯⑰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22—23、62、29、63、62、66、13页。
⑦ 埃里克·伯特赫尔:《社会政策与社会改革》,图宾根1957年版,第20页。
⑧ 沃尔夫冈·莫姆森:《大不列颠与德国的福利国家的形成》,斯图加特1982年版,第142页。
⑨②②⑦ 约亨·施特鲁韦:《通过社会政策带来的发展》,科隆1989年版,第39、36、39页。
⑩ 洛伦茨·冯·斯太因:《德国的社会主义》,达姆施塔特1974年版,第46页。
⑫ 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科隆1976年版,第166页。
⑬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新教伦理》,居特斯洛1981年版,第360页。
⑭⑮ 奥托·海因里希·米勒:《德意志史》,法兰克福1950年版,第195、196页。
⑯⑰ 赫尔曼·克伦茨:《德意志经济史》卷I,慕尼黑1981年版,第245、246页。
⑱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1987年版,第165页。
⑲⑳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37、138页。
㉑⑳⑳⑳⑳⑳⑳ F.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5、17、28、27、23、9页。
㉒⑳ 阿尔诺·克勒纳:《德意志工人运动》,科隆1980年版,第59、67页。
㉓ H.科赫:《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起源以及它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慕尼黑1973年版,第127页。